

中国崛起与对外战略调整

赵可金

内容提要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中国崛起提前进入崛起冲刺期。在崛起冲刺阶段,中国需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战略,以支撑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后的国家利益格局。迄今为止,中国在大战略上的犹豫不决已经开始呈现出负面效应,如果不能尽快实现战略调整,将会最终伤及中国崛起的基本趋势。从战略界的讨论来看,围绕着中国战略调整存在着不同设想,所有这些设想都没有从全局上把握中国战略调整的方向。为此,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抓住时机抓紧制定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已经是刻不容缓。

关键词 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崛起 大战略

作者简介 赵可金,现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胜因院 27 号,100084。

China's Rise and Its Foreign Strategic Readjustment

Kejin Zhao

Abstract: The explos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has unexpectedly brought China in advance into the final sprint stage of China's rising strategy. In this stage, China should accordingly draft its foreign strategy which can support China's new national interest structure after join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us far, China's hesitation attitude on drafting grand strategy has already increasingly taken on negative effect. If we could not bring out the new strategy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fundamental trend of China's rising will be blocked in the end. Based on the strategic debates among academia, there are different proposals on China strategic readjustments which do not grasp the guideline of new strategy proceeded from the situation as a whole. So, In order to meet the urgent need of the new situation, seizing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and drafting the new grand strategy for China's rise have already been a task which brooks no dela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China's Rise, Grand Strategy

近代以来,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一直面临一个尖锐问题:经济优势无法转化为战略优势,泱泱大国在中外对决中最终沦落到丧权辱国的地步。据史家考证,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清王朝的GDP是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强,而号称日不落世界帝国的英国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比美国加欧洲的总和还多得多。^[1]当时,中国经济不可谓不富有,GDP在世界上仍然是富甲一方,令西洋人羡慕。然而,中外战略博弈的最终结局如何呢?不列颠的几十艘远征舰船就可以将数十万清廷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1860年,英法联军区区一支

2 万人的军队便可以直捣首都北京。后来，虽经洋务运动以求所谓“同治中兴”，到 1894 年，大清国的 GDP 仍然是日本的 9 倍，然而，甲午一战，泱泱大国竟然不敌近邻日本一个蕞尔小邦，把台湾割出去，并赔偿相当于日本 GDP7 倍的白银，一直令国人耿耿于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特别是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 GDP 总量再次有望在年内超过日本，向世界第一的美国看齐。然而，当年面临的挑战再次考验中国，中国的经济优势仍然无法有效转化为战略优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巨人，战略新手”，在战略优势方面不仅十分稚嫩，而且在重大的战略角逐棋局中几无优势可言。在全球问题上，中国缺乏做美国战略棋手的大国勇气，在很多问题思虑再三，举棋不定。在地区问题上，中国不敢与周边国家建立战略关系，尽可能地在战略意图上遮遮掩掩，犹豫不决。在维护合理铁矿石原材料价格、突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围、反击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等功能性领域更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模糊态度，不仅令世界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报以猜忌和怀疑的目光，而且也令中国自身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战略号召力。面对中国迅速崛起的趋势，抓紧制定中国大战略日益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紧迫问题。

中国崛起冲刺阶段的战略吁求

2008 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国际地位的突然上升，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期盼急剧增加，“G2 论”、“中国模式论”、“中国道路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论”迅速涌现，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联合国系列峰会、G20 峰会、中国国庆阅兵等一系列事件的国际舆论反应来看，中国崛起已经从原来的逐步适应阶段提前进入了“崛起冲刺”转型阶段 [2]，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崛起从原来不受关注的状态进入饱受关注的中心地带，崛起国家开始面临既有大国的日益强大的压力，必须加快发展步伐，尽快实现综合国力与第一世界大国看齐。为此，崛起国家必须尽快调整原来的对外战略，在冲刺阶段思考选择地位和身份改变后的战略布局，以适应其国际地位结构转换的新现实。

古今中外，不乏有提前进入战略选择期的先例。据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研究，由于一战的影响，美国在几年内突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呼吁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多角色，美国国会拒绝了。 [3]然而，随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二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彻底放弃孤立主义战略，确立国际主义的战略。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最初准备“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4]然而，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和“三大战役”的顺利发展，解放军在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一下子从防御转变为主动，这一转变来得突然，超出了预期，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根据“人民战争转折点提前到来”的现实迅速调整，及时提出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5]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绝不是实力提高后骄傲狂妄心态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国际地位和战略态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国际地位变化所引发问题和挑战的性质所决定的。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2008 年金融危机出现的中国外贸形势促使我国的发展战略转型，逐步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经济发展战略。自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推动出口逐年增长的同时，也令中国日益产生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钢铁、水泥、建材、风能等许多领域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 [6]面对中国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在战略上如不尽快从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变为内需增长型战略，在外交上就将面临国际范围内防不胜防的保护主义反制措施，甚至引发严重的外交争

端和国际关系动荡，最终损及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金融危机下欧美国家的低迷和中国的风景独好，很容易刺激西方舆论界的神经，原本还有些模糊的中国崛起印象一下子清晰起来，

为什么中国与众不同？这是寻常百姓马上就想到的问题。这一急剧的心理变化一经媒体鼓噪，立刻就成为一些企业、利益集团乃至政治领导人的口实，拿中国说事、以中国转嫁矛盾和危机自然就会成为这些力量赢得支持十分方便的策略。于是，针对中国产品的双反措施来了，名目繁多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来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责任也来了，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接踵而至。所有这一切，其深层的战略意图都是让中国买单，成为一些国家转嫁金融危机的牺牲品。形势的发展日益表明，金融危机一下子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位次，凸显了可能多年以后中国才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究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角？相应地，在战略全局上，中国从战略机遇期提前进入了战略选择期：中国究竟是加快全球化进程，迅速确立与其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战略？还是继续维持现状，在现有的战略框架内延续具体问题个案处理的传统思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面对中国国际地位急剧变化后出现的新问题，单纯靠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一对一的策略已经不敷为用，所谓韬晦战略要管一百年的看法决非与时俱进的辩证观点。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以及刚刚举行的中国国庆阅兵，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短时间内接连上了三个很大的台阶，中国现象引人侧目，中国模式高度关注，中国未来令人羡慕。时至今日，即使中国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的低调姿态，也难以遮蔽中国外交的光芒了，必须进行对外战略的转型和调整。事实上，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的思想，比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营造持有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7月第11届使节工作会议上，及时将提高我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置于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为外交工作提出了提高我国形象亲和力 and 道义感召力的新任务[7]。然而，迄今为止，我国还缺少以提高国际政治影响力为核心的外交战略，从外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向以提高政治影响力为首要任务的战略转型非常急迫。然而，这些观点更多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指针，是关于未来蓝图的理想规划和战略目标，它们需要具有操作性的战略布局作为支撑，需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予以现实化，需要进行实战性的战略思维创新。换言之，中国战略转型辩论的重点不是应该说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和怎样才能实现目标的问题，努力回答一个快速兴起国家的对外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也是大战略的核心问题。

中国的大战略最初来自于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亦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争取第二世界，分化和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8]这一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清晰易懂，操作性强，成为一段时期中国外交的主导战略。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行，并受冷战终结的影响，这一以反霸为核心特征的大战略逐渐为集中精力推动现代化建设和韬光养晦的战略指导方针所取代，加上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变得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大大增强了中国选择大战略的复杂性，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进行战略设计和战略选择的决心。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大战略迟迟难以出台，在世界大变革和中国大变革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大战略滞后呈现出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

从一个出台方面来说，面对中国崛起进入冲刺期的实际，中国迟迟不能进行大战略挑战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中国大战略的滞后，使得各个领域的战略手段缺乏整合，弊端日益突出。缺乏战略上的立场协调、节奏调谐和尺度把握，使得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在处理日常事务时自行其是，不仅无法形成战略能力上的交响和共鸣，而且形成了相互抵消和彼此掣肘的内耗，大大限制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影响力。目前，中国在应对很多问题上惯

常采用的举国体制，已经无法避免来自形形色色的部门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侵蚀。越来越多的部门都在积极游说最高领导层把自己主管部门的利益看作是核心国家利益，每一个地方都把本地的发展看作是高于一切的首要选择而不关心国家发展全局可能的损失，每一个小团体都在谋求着有利于自我的发展规划，而不大关注会不会伤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根本。此种低水平自相残杀的内耗与内讧，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影响力。中国大战略滞后更可怕的后果是，利益分化导致部分领域的“分利集团”在绑架了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还伤及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认同。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已出现了缘于社会利益分化而产生的“新阶级斗争”危险，尤其是在草根领域，各种极端主义情绪急速发酵，几乎每一种主张哪怕是合理的主张都会受到来自自己人最为猛烈的攻击。此种草根领域中的极端对立情绪，最终有可能伤及我们来之不易的民族精神，耗散整个民族的战略影响力。自1989年以来，我国对外战略总体是自我保护。然而，当我国实力地位上升到世界第二后，我已经无法再隐藏实力，也无法逃避国际责任，因此采取主动塑造外部国际环境的战略将比自我保护的战略更为有效。目前我国在海外的利益拓展速度很快，根据科学发展观与与时俱进的思想，及时进行对外战略转型不但可以跟上海外利益拓展速度的需要，而且能形成促进我海外利益拓展进一步速度的良性互动。

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辩论

从国内学界来看，关于中国大战略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9]根据国内学界对中国今后大战略调整的方向，可以将国内现有成果和代表性观点划分为五派看法：

1. 韬光战略派，认为韬光养晦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继续保持，中国对外战略短期内不能做出重大调整。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战略方针是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对外战略方针，在将近 20年内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针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现象，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坚持中国要恪守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认为 中国的崛起道路很长，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刚刚开始，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至少还要管一百年。 [10]吴建民的这一看法在政策界居于主导地位，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章百家在《光明日报》2004年 10月 26日发表的《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与经验》、文化部的蔡武、前驻外大使王嵎生等在不同场合都认可这一判断。 [11]蔡武在 2006年 3月《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无论中国取得多大成就，都应该在世界上保持一个谦逊谨慎的形象，坚持“韬光养晦”。 [12]曲星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中国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在国际社会中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 [1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李义虎从中国外交哲学的角度，强调中国外交要坚持“韬光养晦不可丢，有所作为不能少”，不能急于对外交战略作出调整。

总体来看，韬光战略派的前提是中国国力还不足以支撑在国际上有更大的作为，一旦改变“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就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破坏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最终危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这一看法对金融危机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急剧变化估计不足，对韬光养晦对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效果估计过高，认为只要中国摆出韬光养晦的谦虚姿态，中国的和平发展就不会出现大的麻烦和障碍。显然，这一看法没有充分认识到现有中国对外战略面临挑战和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是一种相对稳重而保守的看法。

2 拓展战略派，认为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领域应当拓展，战略思维应当创新，以适应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变化和需要。

面对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新形势，一些学者针对韬光养晦战略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提出要平衡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他认为尽管韬光养晦仍然十分必要，但当今世界上重大制度和秩序的调整改革都会要求中国参与，这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意愿，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应对这个改变，在具体领域上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同样是非常重要的。[14]显然，这是一种在韬光养晦战略基础上的拓展战略观点。相比秦亚青教授的谨慎，王逸舟在《中国外交新高地》、《中国外交的影响因子分析》、《中国外交六十年》等著作和论文中则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转型的战略新理念，认为中国外交要拓展更多领域，正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或者叫革命性的转型。总趋势是更加重视以人为本，更加重视把国际社会看成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支点，更重视国际合作。[15]王逸舟的这一看法是拓展战略的典型代表，受到了包括北京大学的王缉思、叶自成，清华大学的胡鞍钢、中共中央党校的门洪华等学者不同程度的赞同，王缉思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以及《中国国际战略评论》中收集了一大批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论文，认为中国要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创新战略思维，特别是为和谐世界观提供战略支撑，主张战略研究应该更多关注如何做而不是怎么说的问题。[16]叶自成教授在《中国大战略》、《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中则身体力行，为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设计，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大战略，并提出了优先发展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培养大国心态、继续对外开放、实行追赶与超越相结合的战略等具体设想。[17]胡鞍钢和门洪华在《中国大战略》、《第二次国家建设》等著作和论文中提出了富民强国的战略构想，并提出变动应付为主动谋划的战略思维。[18]

不难看出，拓展战略派看到了中国参与世界后外交基本格局的变化，认识到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丰富内容和复杂要求，主张应该将对外战略向经济、社会、人文、环保等新领域拓展，并在国际合作、国际责任等方面创新战略思维，这些看法都是非常敏锐和重要的。可惜的是，这些研究还刚刚起步，特别是对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战略深层矛盾还缺乏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和深化。

3 融入战略派，认为中国融入世界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应当主动制定融入国际社会的战略，逐步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时殷弘和蔡拓等教授为代表，就积极推动中国制定融入世界的战略。时殷弘认为，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追求安全和发展的两大目标出发，中国必须坚持搭车和超越的战略。所谓搭车，是指鉴于目前和今后很长时间内世界总的来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共同体占显著上风，中国必须通过必要的能够承受的妥协来获取我们所处的基本环境中蕴含的种种机遇。所谓超越，就是要求中国参加或努力争取参加所有可望使中国获益显著大于代价的国际安全机制，特别是以东亚大国强国的身份参与创设东亚区域多边安全机制并在其中参与发挥全面主导作用。[19]时殷弘的这一看法后来在《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也坚持他一贯的看法，认为唯有理性地、准确地、全面地理解全球化，才能在不断融入、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中为中国也为世界开辟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20]近年来，融入战略论深受一批青年学者的青睐，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教授认为中国当先首要的是制定中国周边制度战略，以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21]中共中央党校的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中从国家实力、战略理念和国际制度三个变量设计了一份中国大战略的路线图，提出了东亚一体化战略、软实力战略以及开放国家战略等一系列新概念。[22]

显然，融入战略派对中国参与世界的未来前景相对乐观，在战略设计上比拓展战略派更为大胆，也提出了名目繁多的新观点和新主张，然而，这些主张更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缺乏对战略研究的实证调查和近距离观察，虽然新看法层出不穷但不免有纸上谈兵的嫌疑，很多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和推敲。

3 孤立战略派，认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同时，来自外部的战略压力不断加大，危险和挑战更加严峻，中国应当在战略上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巩固战略安全的防线。

面对冷战后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相当严峻，片面强调韬光养晦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和指导外交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应当依靠自己主动涉及我国的外交和安全战略。清华大学的楚树龙在分析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基础上，认为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没有利益、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同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展开全面、正面的对抗和较量，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不当头”的外交策略方针，重点是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23]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周建明提出，对中国来说，要谋求国家安全只有依靠自己，必须抛弃一厢情愿的想法，面对现实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来思考自己的安全处境和安全战略。^[24]南开大学的张睿壮教授认为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今时代的主题，冷战后核武器和战争危险都更加严峻，对美国一极独霸的危害决不能放松警惕，丧失斗志，只讲妥协，不讲斗争，只讲委屈求全、不讲针锋相对。他建议中国外交要改正内在的理想主义哲学，在国际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正视现实、加强国际忧患意识。^[25]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张文木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论中国海权》等著作中，对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地缘环境作了深刻的分析，鲜明地提出“枪杆子里出大国”的主张，认为中国只有依靠自己发展战略力量，才能在世界中具有一席之地。^[26]

孤立战略派更多看到了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危险和挑战的严峻性，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角得出了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维护不能片面依赖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和妥协，此种观点在安全领域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在对战略环境的判断和战略思路的设计上也发人深省。然而，此种观点过于强调中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倾向，过于强调全球化世界趋势可能的严重后果，不免有以偏概全的问题，没有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没有从国际格局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高度把握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故而在战略设计上的很多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5 信誉战略派，认为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战略必须日益重视政治信誉和自我创新能力的培养，进而整体上巩固中国崛起后的战略利益。

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致力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崛起的研究，他在《大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中认为，中国崛起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可分为准备、起飞和冲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战略。在崛起冲刺阶段，中国经济上成为重要的世界工厂，政治上的影响力已扩展到全球范围，军事上承担起区域外的安全责任，中国的对外战略应该相应作出调整。^[27]同时，他在《中国崛起及其战略》、《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王霸天下》等著述中认为，中国崛起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成长过程，也需要稳定制度以保障长久的崛起机遇，特别是自我创新能力的培养，要靠自我而非从外部引进。在崛起过程中，要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采取更透明的对外政策，更注重与周边国家及欧洲国家的关系，注重提升国家的战略信誉，在战略信誉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采取经济利益服从于战略信誉的原则，中国在日渐强大的同时应该有两个选择：中国可以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系统，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方向。^[28]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近年来组织本院研究力量完成的一系列成果中，也日益重视中国参与世界中的战略信誉和战略

支撑点的问题，提出了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一系列战略新思维。[29]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中国必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大循环，并制定中国主导的对外战略，才能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30]

战略信誉派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动全局出发，站在提升中国国家战略信誉的高度，思考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问题，是一条比较稳妥的战略思维路线。如果能够在及时准确把握战略态势变动的基础上，提出一份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路线图，必将对中国外交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方向

事实上，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心。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崛起后成为与美国一样的霸权，或是比美国更坏的霸权。[31]中国在崛起冲刺阶段要减少外压力，确保成功的主要原理是要得到国际社会主流力量的欢迎和支持。当国际社会主流力量支持中国取代美国为世界领导国时，就没有外部力量可以阻止中国崛起的最后成功了。因此，对中国来说，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才能使国际社会的主流力量相信中国崛起后的国际制度将是对他们有利的，至少是比现在的国际制度对他们有利。对于这一问题，国际主流力量对于中国崛起后的国际形势判断并不取决于我国的宣传工作，而取决于我国的对外战略设计。关键是要抓紧制定中国的大战略，在战略设计、道统重建和制度创新上下功夫，积极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积极设计大战略，强基固本。面对新世纪的复杂挑战，从战略全局出发，战略的设计应该牢牢把握国家利益格局变化的方向，统筹好本国利益、他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努力增强外交服务多样化利益的能力。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外交工作的对象更加多元、手段更加多样，外交工作正从以传统外交为主向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并重的方向发展。任何国家都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切实转变观念，立体思维，立体操作，打造官民并举、政经文互动、相互配合的全方位外交，多领域、多角度地维护好国家整体利益。具体来说，设计大战略需要做好四项统筹：

一是统筹国际、国家和国内，提高外交统揽全局能力。近年来，现代外交中遭遇的诸如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汇率、地区热点问题等，都已经上升到战略全局的高度，不仅事关国际大局，也关乎国内发展大局，每一个选择都会通过股市、汇市、房市等牵动着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节奏和进程，外交的敏感性、脆弱性、影响力都显著增强，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转化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大事，比如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产品质量问题等，同样国际中发生的所有大事都会牵连中国，这就要求外交必须牢牢做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统揽外交全局的能力。

二是统筹地区、国别与领域，提高外交防范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国家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某一个领域和地区的功能性问题，而是涉及几乎所有领域和地区的结构性问题，国别性问题、地区性问题和各个功能性领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领域外交中不足挂齿的小事，放在某一个特定地区就可能变成事关全局的大事，此种变化增大了外交运筹的难度。比如奥运圣火传递本来是一桩纯粹的体育活动，但在传递过程中在某些地区就因为个别政治势力的阻挠而演变成事关中国外交全局的大事。全球发展要求现代外交必须要努力统筹国别、区域外交与领域外交，提高外交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的能力。

三是统筹单边、双边与多边，提高外交综合协调能力。参与全球化进程，使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分散性问题，而是彼此密切相关的系统性问题。原先属于双边外交解决的问题越来越需要通过多边渠道才能解决，在多边国际舞台上的问题也离不开

密集的双边接触，气候变化问题、朝鲜核问题、伊拉克问题、金融峰会治理金融危机等，都是如此。这就要求外交必须注重统筹双边和多边，加强协调，提高中国外交综合协调的能力。

四是统筹国家利益、他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提高外交社会服务能力。全球性问题的在 20 世纪中叶的集中爆发，把人类推向了致命危险的边缘，人们日益面临资源短缺、生态危机、核冬天灾难、生物多样性丧失、德性衰败等严峻的社会危机。全球性问题的涌现，促进了全球相互依赖和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全球性意识与全球价值的确立，这一重要发展有力的超越了束缚公民社会全球化的国界障碍，促进了公民身份的全球化，人民标准逐渐超越国家标准。在此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尤其是经贸交流、社会往来和国家间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上升，摆在国家面前的议题越来越复杂而多样，议题与议题彼此交错，形成了一种“议题网”的格局。身陷议题网的国家如何判断和甄别在具体议题上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一个专业化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次，振奋民族精神，重整道统。在全球化时代，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我们是谁？”的疑问。在“用脚投票”的流动性社会，中国无法回避来自多元移民社群的冲击，各种超国家认同、次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都在慢慢侵蚀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传统的中华道统陷入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等浪潮的推动下，经济成分、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一个主义”、“一个信仰”是行不通的了，取而代之的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多样化的社会阶层和多元化的理论思潮。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社会快速传播，各种传统文化形式不断涌现，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正如有些学者总结的那样，“中华民族”的符号已经由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等政治性符号演变成了‘黄帝’、‘炎黄’、‘黄河’、‘长江’、‘长城’、‘龙’等文化符号”，“儒家文化和传统再次被认同，奉为代表中华民族的符号，以象征民族的政治团结和文化统一”[32]。民族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改革开放后最能够整合民族与社会的力量，其顶点性事件莫过于 2002 年的中国申奥成功和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进军世界杯决赛圈，这两件事情本来都只是体育事件，却引发了社会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33]。值得指出的是，在现代国家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复兴必须伴随着其存在基础的巩固，必须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潮流加以正确引导，使之汇集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个人和集团能量快速提升，如果不能将其纳入国家认同的框架之中，就会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国家分裂的破坏性力量。

因此，中国需要高举中华价值和中华民族文明的旗帜，从草根领域行动，挖掘优秀民族文化精神，推动自梁启超、胡适、顾准等历代先贤继承下来的中华道统创造性转化，确立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中华价值系统，成为振奋国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因此，置身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开放国门参与世界的历史性变革，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在市场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如何超越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政党、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隔阂，创新政治认同建设的机制，建立新的民族团结与各地方、社会群体以及具有公民身份的各民族成员对国家认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

最后，大力推进国家转型，创新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民族国家是一个国家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制度表达形式，也被称之为资源提取效率最高、功能最为强大的现代组织形式。然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族国家正在慢慢失去其制度优势，全球化的国家（globalized state）的理念不胫而走：对内逐渐从硬统治向软治理和善治转型，对外逐渐从领土型国家向认同型国家转型，[34]这就呼吁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国际制度领域进行一系列的创新，积极建设一个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中国。

从制度形态上来看，中国国家转型意味着必须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对政府官僚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和企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建立能够发挥市场功能的政府体制和制度框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几乎每几年就发动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不断发展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提供制度基础。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是努力使得官僚制国家机构更加合理化，提高功能、效率和可信度。特别是 1998 年朱镕基领导下的市场导向的机构改革，基于功能主义和市场导向的原则，加强了国家经贸委员会，弱化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切断了军队和商业的联系，基本上符合政府制度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除了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以调整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之外，中国还推进了从财政放权、利改税到分税制的税收制度改革，实施了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和重组银行体系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制度改革和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向着现代经济国家的方向前进。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市场化战略的推进，加快制度创新，推动国家转型越来越成为关乎中国战略全局的要害。其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十分关键。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交错地带，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未必一定要遵循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多样化社会来说，在急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带有保守色彩的政党发展道路或许是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战略，通过政党的组织和领导，在维护必要的社会稳定的同时，作为一种后备的政治救治措施，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整合社会秩序也是必要的。

结论

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市场化战略的推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由一个相对孤立于主流国际社会之外的体制外革命者转变为一个融入国际体系的发展中大国。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提前令中国进入崛起的战略冲刺期，在国际力量对比态势急剧变化的关头，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确立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快速提升的大战略和对外战略，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尽管自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战略界关于战略调整的辩论就一直持续进行，并且形成了韬光战略派、拓展战略派、融入战略派、孤立战略派和信誉战略派等不同观点，但对于中国应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大战略和对外战略，却始终没有能够进入中国政府的决策视野，中国大战略始终迟迟难以出台。

2008 年以来，中国大战略滞后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进行战略调整的必然性。形势逼人急，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国应该抓紧研究制定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大战略和对外战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提供战略支点。其中，设计大战略、振奋民族精神和推动国家转型，是战略调整的三个关键问题，应该特别予以重视。

[1] Angus Madd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1998, p.25.

[2] 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著：《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9 页。

[3]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55 - 75 页。

- [4] 毛泽东,“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5]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7 页
- [6] 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严重性程度已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参阅曹建海、江飞涛:《中国工业投资中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 年版。
- [7] 吴绮敏,“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09 年 7 月 20 日,第一版。
- [8]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1974 年 2 月)”,《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0 页。
- [9] 与战略辩论比较接近且有代表性的专著包括滕藤主编:《邓小平理论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国家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叶自成:《中国大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楼继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马振岗主编:《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环境与理论探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年版;时殷弘著:《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对外战略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李而炳主编:《21 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4 年版;楚树龙、金威主编:《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阎学通、孙学峰:《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此外,国内学者近年来发表了 1046 篇论文研究对外战略调整的代表性作品。
- [10] 吴庆才、李静,“吴建民:六十年三大变 中国外交进入黄金时间”,中新社华盛顿 2009 年 5 月 31 日电。
- [11] 章百家,“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与经验”,《光明日报》2004 年 10 月 26 日。
- [12] 蔡武,“努力创造更加有利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学习时报》2009 年 3 月 28 日。
- [13] 曲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
- [14] 李新,“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间寻找平衡”,《21 世纪经济报道》2008 年 3 月 29 日。
- [15] 王逸舟主编:《中国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王逸舟,“中国外交影响因子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9 期;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16] 王缉思,“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思维定式的一些思考”,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 - 20 页。
- [17] 叶自成著:《中国大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叶自成著:《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 年版。
- [18]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增订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19] 时殷弘,“21 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1 期。
- [20] 蔡拓,“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第 16-27 页;蔡拓,“全球化观念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1 期。
- [21] 苏长和,“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中国途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 1 期,第 7 - 14 页。
- [22] 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 [23] 楚树龙,“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战略与管理》1999 年第 4 期,第 13 - 18 页。。
- [24] 周建明,“关于我国对外战略的几个问题”,《国际观察》2001 年第 3 期。

- [25] 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 [26] 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张文木著:《论中国海权》,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
- [27] 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28] 阎学通、孙学峰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阎学通:“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环球时报》,2007年5月22日。阎学通、徐进等著:《王霸天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 [29] 杨洁勉等著:《大合作: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洁勉等著:《大整合: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版;杨洁勉等著:《大磨合:中美相互战略和政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杨洁勉主编:《国际体系转型和多边组织发展:中国的应对和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杨洁勉等著:《大体系:多极多体的新组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30] 黄仁伟著:《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黄仁伟等著:《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31]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新战略三角: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赵晨译,《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
- [32] 徐迅著:《民族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51页。
- [33] 郭正林、刘鹏,“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理论视野与中国经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3年9月18日。
- [34] Ian Clark,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0.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